

超然策略症候群^{〔*〕}

——梭罗现代化背景下的身份建构

○ 戚 涛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本文运用新精神分析学派的性格理论,结合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点,探寻梭罗话语背后被遮蔽的生成机制,找出其针对的主要问题,及背后隐含的策略体系和身份利益。论文主张梭罗的话语实践与环保问题并无切实关联,而是他在现代化背景下,面对自身的身份困惑,对当时流行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雅传统的一种反拨。在其超然型性格的影响下,他采取需求最小化、独处、禁欲等策略抵御这些话语的压制。在批判他人唯利是图、耽于享乐、精神空虚的同时,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生活简朴、内心丰富独立的成长中哲学家”的优越身份,并通过对古典哲学家怀旧式的内投射使之合法化。

〔关键词〕梭罗;超然型策略;身份;物质主义

虽然生前颇受非议,梭罗的声誉在身后却始终处于上升态势。最初,学界主要把他当作爱默生的弟子、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来看待。1970年代环保主义兴起后,梭罗被部分学者推崇为“环保主义之父”,逐渐摆脱爱默生的影子,并随着生态批评的兴盛,地位愈发稳固,大有超越爱默生之势。正如美国作家 Robert Sullivan 所指出的,这种盛誉更多建立在当代人士对其自然观的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读基础之上。^{〔1〕}这些“主义化”的解读虽然有助于把握梭罗思想的某些特质,却有牺牲其复杂性的危险,令我们与真实的梭罗渐行渐远。

某种意义上,早期有关梭罗地位的争论,较之现今近乎一边倒的溢美评价更

作者简介:戚涛,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美国文学、文学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美国文艺复兴与美国民族认同的建构”(09BWW017);安徽大学“211”工程学术创新团队基金的研究成果。

具启发意义。例如,梭罗的早期捍卫者 Odell Shepard 曾经感叹,有关梭罗的“主要兴趣和特性,没有两个批评家的意见一致。认为他是博物学家者有之,认为他是‘未开化之人’者有之;有人认为他是人文主义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个思想家。然而,从这样、那样阐释中,我们何以发现他思想的中心所在呢?”^[2]近年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表达对梭罗思想复杂性的关切。例如,专栏作家 Danny Heitman 表示,梭罗著述之巨,让人难以全盘理解,这诱使读者有选择地引用他的话,断章取义以映证他们心目中所钟爱的梭罗。他说,许多读者面对梭罗谜一般的人格面具,只能求助流行文化对他生活的简单素描……而他丰富、真实生活中诸多微妙、矛盾之处,却时时拷问着他在大众心目中的流行形象。^[3]

基于对其话语复杂性的考量,本文尝试运用新精神分析学派的性格理论,结合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点,试图还原梭罗话语的复杂性,找出梭罗文学话语针对的主要问题,及其背后隐含的策略体系和身份利益。

一、性格与文学话语

要还原梭罗文学话语的复杂性,首先有必要充分认识文学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自身的复杂特性。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是对现实扭曲的反映,尽管如此,它如同一个“屏风”或“滤镜”,让我们还是能够透过它或多或少瞥见现实的些许真实状况。多数人无法看穿意识形态的幻象,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某种内在的曲折关系遮蔽了它们产生的机制,使它们看上去似乎是在描述现实。所以伊格尔顿认为,和诊断疾病一样,只有揭示其被遮蔽的生成过程,产生的可能条件,才能真正解读一种意识形态。^[4]而以恩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和卡伦·霍妮(Karen Horney)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学派的性格理论,为我们深入解读意识形态,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弗洛姆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在“存在决定意识”的二元对立中,加入了第三项——人的性格结构,从而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精神分析结合起来。他认为要想了解社会过程(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学话语),就必须把握性格这一关键概念。他认为性格是“人的需求动态地适应某一特定社会的特定存在状态”的结果,是人类在与环境互动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用来替代本能的一个策略系统。性格一旦形成,它“反过来也决定个人的思维、感觉和行为”。所以,思维并不是纯粹的智力行为,越是形而上的东西如伦理、哲学、政治(当然包括文学话语),越要受到思维者性格结构的制约。他主张,每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和学说“都有其情感的发源地,而这种发源地又都根植于个人的性格结构之中”。“思想有着情感的发源地,这一事实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把了解某种文化精神的钥匙”。^[5]

这意味着,性格会让人们近乎本能地喜欢某一类价值观、人或事物而排斥其他。有了性格的调节,我们的思维、感觉、行为不再是完全自由的野马游缰,而是存在很强的方向性,成为塑造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

而该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霍妮的性格理论,则为我们分析性格如何影

响着人们的认知与价值建构,提供了方向。她将人的性格策略分为五大类型——顺从型(the compliant type)、自恋型(the narcissistic type)、傲慢—报复型(the arrogant-vindictive type)、超然型(the withdrawn type)和完美型(the perfectionistic type)。^[6]按照她的理论,不同性格之人面对同样问题时,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当这些策略固化为一种强迫性需求的时候,就会形成价值偏好。例如顺从型性格者强烈需要他人的爱与肯定,害怕拒绝别人或者被认为不可靠、不可爱。他们不喜欢竞争、冲突的场合,偏爱私密、和谐的空间。他们理想的自我形象包括忠贞的爱人、善良的天使、忠诚的朋友等。同样,其他性格也分别对应这特定的内心需求、价值取向及理想的身份。由于本文的焦点是梭罗,这里主要关注与之相关的超然型性格。

霍妮认为,超然(或“逃避”)性格者在困境面前,不像顺从性格者那样选择与环境妥协,或像傲慢—报复性格者那样进行激烈的抗争,而是用回避矛盾、疏离他人的策略,来减轻焦虑、维持自我的完整。这一主导策略派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性格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强烈的自给自足的需要,希望万事不求人。为此,他会有意无意地缩减自己的需求。倘若获得快乐意味着要更多依赖他人,那么他宁愿不要快乐。其次是强烈的隐居的需要。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才会让他感觉从容、安适,所以他更喜欢单独工作、睡觉、吃饭,而不愿与他人打交道。再次,他们对于外界影响和约束有着极其敏感的排斥心理。别人希望他能做某些事情,或希望他能以某种方式行事,都会让他感到不自在并因此产生逆反心理。因此他们竭力避免承担长期的责任义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次要的特征,包括“极需优越感,通常轻视别人”、“不屑于追逐世俗的成功、对努力有深刻的反感”、情感区隔、禁欲主义等。

他们的交易是,“如果不向别人索取,别人就不会来打扰他们;如果不作尝试,就不会失败;如果对生活一无所求,就不会失望”。^[7]自给自足,不依赖,不受约束,不为欲望和激情所困,不为压力所扰,拥有内心的安宁,是他们理想的生活状态。

由于这些性格特征形成后会强烈制约一个人的思维、感觉和价值建构,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与之存在强烈对应关系的文学话语。中国的隐士文学就是一例。正是“心远地自偏”的疏离、独处需要,使得隐士们如此强调亲近自然,因为自然是脱离人群、逃避尘世烦恼的最佳去处。而“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张载),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所营造的意境,则是他们“高雅闲适”理想身份的最佳写照。

二、梭罗的超然策略症候群

同中国隐士一样,梭罗亲近自然并非出于环保的考虑。按照梭罗的叙述,那时瓦尔登湖生态十分良好——湖畔有着成片的森林,夜晚垂钓,有时大约有几千

条小鲈鱼和银鱼围绕着他。^[8]湖上水禽很多,其他鸟类数量也很庞大。重要的是,梭罗对待自然的态度基本上是人类中心的——“我们看到他伐木,污染湖泊,与垦荒者、矿主合作”。^[9]不仅如此,他把渔猎看作是不错的娱乐——“我既不可怜鱼,也不可怜饵虫……不管人们怎样根据人道来反对,我还是不得不怀疑,是否有同样有价值的娱乐,来代替打猎的;当一些朋友们不安地探问我的意见,应不应该让孩子们去打猎,我总是回答,应该”。^[10]

他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按照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11]也没有体现对环境的关注。种种迹象显示,他亲近自然很大程度上是其超然策略的结果。其话语中折射出来的超然性格症候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 强迫性的自给自足的需求

对超然策略者而言,任何强烈的依恋都会减少其自由,还是根本没有愿望最安全。^[12]因此,超然策略者为了超脱对他人的依赖,会“限制饮食及其他生活习惯并使其保持在一个不需要他花过多的时间或精力去挣钱支付的范围内”。梭罗在《经济篇》中,详细记录了他如何通过不断降低自身的物质需求,实现自给自足。

他主张一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其实少之又少——足以保暖的衣物、足以栖身的棚屋、足以维持体力的食物,外加“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对于勤学的人,还有灯火和文具……几本书”就足够了。在他看来,衣服无非是用来保温、蔽体的,“不过是我们的最表面的角质,或者说,尘世之烦恼而已”。^[13]至于住房,他觉得铁路工人装工具的大木箱,钻几个孔,就是不错的居所。“因为要付一只更大而更宏丽的箱子的租金,就烦恼到老死”,耗费大半辈子的精力,是何等不值。他说,“我们的家具为什么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样简单呢?”为什么“我们老要研究怎样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而不能有时满足于少弄一点东西呢?”^[14]他主张,“简单化,简单化!不必一天三餐,一顿也够了……至于别的,就在同一的比例下来减少好了”。^[15]

为节省开支,他自建棚屋,自种土豆、玉米、豌豆,实验不用酵母、盐、苏打来制作面包,用南瓜和甜菜根自制糖浆,将对他人的需求降低到最低点。对于他无法自制的物品——衣服、燃料等,则通过做零活贴补。他骄傲地说,“我的最大本领就是需求极少”,劳动到能养活自己,就取得了自由证书,“每年之内我只需工作六个星期,就足够支付我一切生活开销了”。^[16]这样,他除了得到“闲暇、独立,康健”,“还有一座安乐的房屋”,“爱住多久,就住多久”。^[17]

这些自白表明,他需求最小化的初衷并非是出于环保、低碳,而是为了降低对他人与社会的依赖,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远离社会,超脱他人的意志,保持心灵的完整与自由。

(二) 强烈的独处的需要和虚幻的满足感

梭罗的超然策略症候还表现为一种与他人保持距离的强烈需求。在《访客》篇,他说“个人,正像国土一样,必须有适度的、宽阔而自然的疆界,甚至疆界

之间,要有一个相当的中立地带”。他感觉跟别人交流,“身体距离得远一点,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几乎听不见彼此的声音才行”。与人“隔湖聊天”是他最中意的交流方式,“简直是一种了不得的奢侈”。^[18]他心目中的理想家园是个名叫霍乐威尔的田园。其迷人之处在于“它的遁隐之深,离开村子有两英里,离开最近的邻居有半英里,并且有一大片地把它和公路隔开”。^[19]为了这一优点,他想象着自己迫不及待地买下它。但这种“遁隐”似乎仍不让他满意,于是他幻想自己“生活的地方遥远得跟天文家每晚观察的太空一样”,幻想“在天体的更远更僻的一角,有着更稀罕、更愉快的地方,在仙后星座的椅子形状的后面,远远地离开了器闹和骚扰”。^[20]

梭罗表面上十分享受这种隐遁生活,说“自己是喜欢独居的”。^[21]“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到国外去厕身于人群之中,大概比独处室内,更为寂寞”。^[22]但是,正如霍妮指出的,超然策略者也有情感的需要,只是他们更加恐惧因此失去自己的独立性。^[23]梭罗并非不感到孤独。他曾经怀疑“是否应当有些近邻,独处似乎不很愉快”,^[24]但他更害怕对别人的需求所带来的不安全感。霍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超然策略者会把情感“限制在人际关系以外的领域”,投射到诸如“书籍、动物、自然、艺术、饮食”^[25]等上面。梭罗正是这样。他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认为“无论两条腿怎样努力也不能使两颗心灵更形接近”。^[26]当他渴望与人亲近的时候,他觉得这只是自己一时情绪失常,当“温和的雨丝飘洒下来,我突然感觉到能跟大自然作伴是如此甜蜜如此受惠……把我想象中的有邻居方便一点的思潮压下去了,从此之后,我就没有再想到过邻居这回事”。对他而言,更接近于他血统、最富人性的不是人,而是自然。“在任何大自然的事物中,都能找出最甜蜜温柔,最天真和鼓舞人的伴侣”。^[27]

因此,他亲近自然,一方面因为那里是脱离人群、降低焦虑的最佳去处;另一方面,因为他赋予自然以拟人化人格,将其情感需求投射到自然中去。与环保并无实际的关联。

(三)对束缚的过分敏感和厌恶

对于超然策略者而言,为了免受焦虑困扰,连自己正当的需求都极力压抑,对外界强加的影响、责任、义务,和其他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事物,自然极为敏感、厌恶。其敏感程度,是衡量一个人超然倾向强弱的良好标准。^[28]这一症候在梭罗身上也很典型,他著名的《论公民的不服从》便是这种敏感的产物。

按他自己的解释,他拒绝缴税并非出于对公平正义的关切。他说,我来到世上并非为把世界变成过日子的的好地方。有人认为1775年的英国殖民政府很糟,对外国货课以重税。对此他极有可能无动于衷,因为没这些外国货,他照样能过日子。^[29]而直接从他头上课税则不同。这一外界强加给他的责任意味着他要多打几周的零工,牺牲自己的独立性,与他通过需求最低化减少对他人的依赖,维护其独立性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因此必须加以抗拒。他说,“我不得不做的是,无论如何都要确保我不为我所唾弃的谬误效劳”。“我不是生来让人支使

的。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呼吸”。^[30]因此,什么都不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不仅这种强制性干涉,梭罗对其内心自由构成威胁的小事也极其敏感。例如,他去做衣服,女裁缝一句“现在他们不时兴这个式样了”,就引起他内心超乎寻常的强烈反弹。他激愤地表示,好像她说的“他们”具有命运之神一样的权威似的,“而我,一听到这神示的文句,就有一会儿沉思,把每一个字都给我自己单个地强调了一下,好让我明白它的意思,好让我找出他们和我有怎么样的血缘关系,在一件与我如此密切有关的事上,他们有什么权威”。^[31]反应如此剧烈,皆因女裁缝触动了“金钱”这根敏感的神经。

对于以需求最低化以换取独立的梭罗来说,任何需要金钱换取的东西,包括赚钱的努力本身,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束缚,必须加以否定。他表示,一个人继承了田地,就变成了土地的奴隶,等于自掘坟墓。^[32]那些想投机挣钱的人,好比“布置好一个陷阱,想捉到安逸和独立性”,但刚要拔脚走开,却发现一只脚已落进了陷阱。^[33]在他看来,养牛就成了牛的奴隶,“不是人在放牛,简直是牛在牧人”;养马就成了马的奴隶,因为你要替他们准备干草,为他们盖兽厩。^[34]一句话,财产都是负累。他说“真的,这东西越多,你越穷”。^[35]

甚至正常的生理需求,日常劳作,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束缚。“人为什么要这样自寻烦恼,人若不吃不喝,可就不用工作了……啊,还有家务!还得活见鬼,把铜把手擦亮,这样好的天气里还要擦亮他的浴盆!还是没有家的好!”^[36]这种对需求(束缚)长期一贯的否定,最终让他演化出一种极端的超然倾向——禁欲。

(四)禁欲主义

霍妮分析超然型性格时,曾提及梭罗,认为他写《瓦尔登湖》时经历着感情上的压抑。“其内心潜伏的对自己变得耽于享乐,或者由此而对自己心灵的自由造成的间接的伤害的恐惧,有时会使他濒于禁欲主义的边缘”。^[37]事实上,梭罗对欲望的压抑不仅限于感情,而是全方位的,带有显著的禁欲主义的色彩。对他而言,任何超过最低必要的需求都是不必要、不明智、庸俗的,必须加以禁止。

最初梭罗只是表现出压抑欲望的倾向。例如,他喜欢钓鱼打猎,“天生有垂钓的嗜好”,将其视作难以替代的娱乐,同时也十分享受肉食。他说,在瓦尔登湖的“第二年,有时我捕鱼吃,有一次我还杀了一条蹂躏我的蚕豆田的土拨鼠……我吃了它……暂时给了我一番享受,不过我知道长期享受这口福是没有好处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将欲望视作一种禁忌,出现自我折磨的倾向。认为肉类不洁,转向素食,是其禁欲倾向发展到极致的一种表现。他说,“近来我一再发觉,每钓一次鱼,自责感就会增加”。随着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他最终选择放弃垂钓。但这并非出于保护动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坦言,随着钓鱼兴趣的减少,他的人道观点或智慧并未增加;起作用的“是个隐隐约约的暗示”。文本线索表明,这种冥冥中的力量就是他的禁欲倾向。他压抑欲望的策略,最终使

得一切与舒适有关的事物,都成为他的禁忌。贪吃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看来,贪吃是肮脏的,所有的肉食都是不洁的,靠珍馐美味来生活,不仅不值得而且可耻。“吃了我的鱼之后,我也并不觉得它给了我什么了不起的营养。既不足道,又无必要,耗资却又太大……我……已经有好几年难得吃肉或茶或咖啡等等了……对肉食的反感并不是由经验引起的,而是一种本能。卑贱的刻苦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显得很美”;任何一个高尚的人,“必然是特别地避免吃肉食,还要避免多吃任何食物”。^[38]那些爱吃麝鼠、肉冻、进口沙丁鱼的人们,过得了“卑劣的禽兽生活”。

甚至一些给普通人带来快乐的东西——酒、咖啡、热茶、音乐,在他眼中都是祸水。他说,“就是这些微小的原因竟然毁灭过希腊和罗马,将来还要毁灭英国和美国”。性欲也是如此——“放纵了生殖的精力将使我们荒淫而不洁,克制了它则使我们精力洋溢而得到鼓舞”。^[39]对他而言,所有的欲望都是一样肮脏的。“如果你要想贞洁,就必须节制”;“天性难以克制,但必须克制”。任何卑欲或淫欲立刻使人变成禽兽。^[40]这说明他禁渔猎、素食、低消费,是他需求最小化策略发展到极致,出现禁欲主义的表现。

上述分析透过性格的视角,揭示了梭罗话语中被遮蔽的一部分生成机制。这些机制的发现,有助于关联其离散的话语,有机地把握其话语的内涵。但这并非其话语的全部。按照伊格尔顿的阐释,意识形态源于整个社会的物质结构,是社会集团为扩大自身利益、重塑社会权力进行角力的话语场,是其扩大自身利益并使之合法化的一种集体自我象征和欺骗性的信仰。^[41]以下本文将结合梭罗的生存环境,探究其话语产生的社会条件;它能促进哪一个特定集团或个人在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利益,并使之合法化;能够帮助个体或集团建构什么样的身份。

三、梭罗话语的文化与身份意义

正如列维纳斯所主张的,一个人总是在与他者的相互关系中获得自身的确定性。因此,要解析梭罗话语的复杂意义,必须将其语境化,置于当时的社会和话语环境中考察。其话语同中国隐士文化虽属同一谱系,但因处境迥异,两者在话语敌人、策略组合、身份利益等方面差异显著。如果说,中国隐士文化是封建专制主义权贵文化挤压的产物,那么梭罗的话语则是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现代价值斗争的结果。令他焦虑的并非环保问题,而是多元化、精神价值缺失、金钱成为压倒性价值尺度,以及消费主义和文雅传统泛滥等因素,给其自我身份造成的缺失。

Shannon Mariotti 对梭罗所处的历史语境有过细致的研究。他认为,随着美国从一个半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波士顿地区人们价值、理想、选择、习惯等,发生了巨变。由于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层日益显著,对物质享受和精致、文雅品味与时尚的追求,蔚然成风。^[42]这种物质主义价值观横行的后果是唯财富和品味论英雄,对弱势群体构成身份压制。加上贫富

差距悬殊,弱势群体即便终日劳作也无法企及哪怕是中产阶层的物质水准,换来的只有疲惫和对自身价值的否定,这令梭罗有着深刻的异化感。

他感叹,即使在美国这样自由的国度,普通人的劳动价值也得不到体现,有着“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找不到空闲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整无损”。这种听天由命的静静生活是令人绝望的。^[43]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里,像他这样一个不愿出卖苦力、整日在山野田间游荡的人,通常被人们视为懒汉、失败者。他颇为忿忿地说,“曾经有个家伙自信地向我——一个成年人建议,让我去他的一个企业里谋个差事,仿佛我一直无所事事,我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是彻底失败的,真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他对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极其反感。他感叹,“这个世界就是个生意场。好不热闹!……除了工作、工作之外还是工作。我想买个空白的笔记本记录我的思绪都不那么容易,因为通常本子都是为方便计算美元、美分而设计的”。^[44]

因此,要把握梭罗思想的文化与身份意义,就必须将它置于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雅传统——这三个对他构成否定作用的他者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中考察。这是除性格外,理解梭罗话语的又一关键。根据与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我们可以将梭罗话语的意义划分为防御、批判、超越三个层次。

1. 防御意义——超然型个人主义

作为一种弱势价值观,梭罗话语的首要功能在于规避强势话语的侵害。应当看到,在当时新英格兰知识阶层,反物质主义者不在少数。许多经济、社会资本相对丰厚的人士将目光投向社会,如 Dorothea Dix、Frances Willard、Horace Mann 分别领导、成立了各自的社会组织,推动监狱改造、戒酒、教育等社会改良运动。而拥有资本略逊的人士则倾向于创新社区生活以找寻归属感。最有代表性的是布鲁克农场。该乌托邦社区的价值取向与梭罗有几分相似之处——因抗拒物质主义的话语霸权而起,目的是“建立一个由思想自由的、睿智的、有文化的人组成的社会”,“导向一种比在相互竞争的体制压力下的生活更为简单和完整的生活”。^[45]但在实现的途径上却与梭罗南辕北辙。李普利等人强调的是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力求通过互助方式获取归属、认同感,同时以平等劳动、共享成果作为克服物质主义的尔虞我诈与消费主义的手段。而梭罗受其性格倾向的影响,采取的却是一种超然型的个人主义,用“最大程度降低需求”、“独处”、“禁欲”三大法宝,对抗敌对话语的压制。

超然策略的基本出发点在于远离引起焦虑的事物,以获内心的宁静。对梭罗而言,“最大程度降低需求”他就可以出离席卷资本主义美国的金钱追逐大战,逃脱变身挣钱机器、在无休止的劳作中被异化的命运。选择“独处”,远离他人,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你们嘲笑也好,炫耀也罢,都与我无关。“禁欲”则起到了与“消费主义”、“文雅传统”划清界限,将后者贬为“他者”的功能。前文提到,梭罗原本是喜欢渔猎的,也很享受肉食带来的满足。但为了抗拒世人对物质享受、精致文雅的品味与时尚的追求,免于在话语交锋中沦为被嘲笑的对象,反

对一切超过最低需求的欲望成为他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因为任何对享受的贪恋,都意味着屈服于“敌人”话语的利爪,而鄙视一切贪欲则可反衬自身的高洁。

这些策略使得他走上了一条与别人不同的超然型个人主义道路。如他自己所言,由于过分害怕失去自由,他希望自己与社会只存在短暂、微小的联系和责任关系。自己为生存打点零工,算是为时代做了些贡献,虽然不是必须,但也心甘情愿。但倘若自己的欲望增长,那么为了满足这些欲望而进行的劳作就会变成苦差事。如果他像多数人一样,将自己的午前午后统统出卖给社会,那么他肯定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他断然不会为了贪图物质享受而放弃自己的生活。他说,“无论如何,我会追寻一条我热爱并充满敬意的人生路,无论这条路多么孤单、狭窄、崎岖”。^[46]

应该看到,这些话语策略有着强烈的时代与文化印记。首先,工业化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为他抗拒主流价值观、选择自己的道路提供了物质基础。他打一个月零工就能挣够他八个月最低标准的伙食费,使得他即便不勤奋工作,也无挨饿受冻之虞。其次,启蒙精神和当时美国社会个人主义、反权威主义思潮的涌动,为他坚持自己生活方式提供了精神支撑。因此他敢于大胆质疑主流价值观——“无论如何古老的思想与行为,除非有确证,便不可以轻信。在今天人人附和或以为不妨默认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变成虚无缥缈的氤氲”。^[47]并且不止一次地表达了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信念。

2. 批判意义——塑造他者:唯利是图、耽于享乐、精神空虚者

虽然超然策略者惯于逃避,但对妨害其心灵自由的东西,却罕见地针锋相对。前文提及,监狱改造、戒酒、教育改革、慈善等反物质主义话语是社会资本相对丰厚者的精英主义话语游戏,与梭罗无缘。犯罪、酗酒、贫穷等社会毒瘤,于他也无太多触动。他急需批判的是对他身份构成直接威胁的话语。因此,他从自己的疏离策略出发,结合自身优势,为自己量身定制了一个以唯利是图、精神空虚与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他者,作为批判的对象。

既然降低需求是他身份策略成败的关键,拜金主义自然是他不得不批判的首要敌人。所以他主张只要沾钱的事,就是肮脏的。无论什么赚钱方式,几乎必然使人堕落。作家或演说家想要通过写作或演讲挣钱,必须首先让自己受欢迎,这让人底线尽失。对财富的渴望将好人变成无视他人权利的魔鬼,而投机客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的表现,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耻辱。他说,破产是必然的。那些发财致富者自以为取得了成功,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他还拐弯抹角地将这些人称为“蠢货”、“凶手”,忿忿地说,“让他们带着他们的非法财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我想他们住哪儿,哪里就是‘蠢货公寓’,如果不是‘凶手酒吧’的话”。^[48]

相应地,从他降低需求、禁欲主义的视角出发,追逐潮流与物质享受是可鄙的。他认为崇拜时尚的人是脑袋里长了蛆虫。像底比斯那样的宏伟是庸俗的。“生活现在是太放荡了。人们以为国家必须有商业,必须把冰块出口,还要用电

报来说话,还要一小时奔驰三十英里,毫不怀疑它们有没有用处”。^[49]

在梭罗看来,对物质的迷恋导致了现代人的另一宗罪——精神的贫乏。他表示,“看来这一片土地上还没有相应的人类文化,我们至今还不得不减少我们精神的口粮,减得比我们祖先节省的面粉还要多”;“我们宁可少造一座桥,多走几步路,但在围绕着我们的黑暗的‘无知深渊’上,架起至少一个圆拱来吧”。^[50]

他认为问题在于人们远离自我,远离坚实的真理(*granitic truth*),用肤浅的八卦、没有价值的新闻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在他看来,一个人内心越空虚,越有时常前往邮局的迫切需要;那些从邮局取信最多,并为自己交游甚广而感到自豪的家伙,实则最可怜,因为他已很久没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了。“没有人立足于真理。他们只是联合起来,彼此相依,立于虚空之上”。^[51]

他说,当我们更渴望文化而非土豆,渴望启迪而非糖果,那么这个世界的伟大资源才真正得到充分利用,培养出来的将不再是奴隶、操作工,而是那些被称作英雄、天使、诗人、哲学家和救世主这样的珍贵果实。^[52]

值得注意的是,梭罗矛头所指并非社会上处境优越的既得利益者,而是同样处境弱势、追随社会潮流的普通人。梭罗在批判他们的同时,也就完成了对自我的界定。

3. 身份意义——生活简朴、内心丰富、独立的智者

当精英阶层以财富、出身、时尚,社会阶梯攀登者以实用技能、创业精神为荣的时候,梭罗的优越感来自于对他人物质欲求的鄙视,和对自身精神丰富、心灵完整的骄傲。他所谓的高贵之人,精神上的丰富、独立与生活上的俭朴三者缺一不可——“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还要按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他认为能代表这种高贵的唯有出身贫寒的古典哲学家——“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过”。^[53]

同所有身份一样,梭罗对自身优越性的建构也存在幻象的成分。正如霍妮所言,因为厌恶竞争,超然策略者往往是在想象中而非现实中实现自己的抱负。^[54]他们“常常有意识地觉得比别人优越,而且可能会以一种夸大的尊严表现于其行为中”。^[55]这一点在梭罗身上也较为显见。他主要通过一种怀旧式的内投射,来维护其脆弱的优越感。

按照定义,内投射是在自我身份认同产生危机的情况下,将某一外部事物的美好特性引入自我,自我因为这个外来特性的注入而变得美好起来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这一机制包含三个要素:(1)外在事物的形象;(2)自我与那个外部事物的互动关系;(3)对该事物和自我的情感着色。^[56]换言之,采用这一机制的个体,首先需要选择一个他所认同的对象,然后定义好自身与这个对象的同一关系,剩下的工作就是夸耀这个外部对象的优点,自我沐浴其中。

秉承其一贯的疏离策略,梭罗选择将其理想自我投射到古典而非当代哲学家身上,表现出明显的厚古薄今的倾向。在他看来,现在即便那些爱读书的人,

往往也只是为了“可怜的便利”而读书,要么只读那些无聊的爱情小说、弱智的童话故事,只会让人“目力衰退,一切生机停止”,智力蜕化。只有古典作品才是最崇高的人类思想的记录,是唯一的、不朽的神示卜辞。荷马、埃斯库罗斯等所著希腊文原著都是启发心灵的英雄诗篇。在他看来,花费少年的岁月学习古希腊文字,哪怕学会几个字,也再值得不过了,因为它们是“从街头巷尾的琐碎平凡之中被提炼出来的语言,是永久的暗示,具有永恒的激发力量”。读这些书“超过举世公认的种种训练”。^[57]

为了建构自我,他拒绝将生活优越的当代学者归入高贵之列。他说,“近来是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后世的作家,就算有才能也“极少能够比得上……古代作家的精美、完整与永生的、英雄的文艺劳动”。就算现在有些教授能读懂希腊文或拉丁文,但很少有人能“掌握一个希腊诗人的深奥的才智与诗情”。^[58]

至于他本人,由于离他的理想身份——哲学家有着相当的距离,他更倾向于把自我诠释为一个“不断上升到更高级、更升华的生命中”的人。阅读古典先哲的著作则是他不断接近其哲学家理想的阶梯。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表达的,“曾有个牧羊人活在世上/他的思想有高山那样/崇高,在那里他的羊群/每小时都给予他营养”。他接着说,“如果牧羊人的羊群老是走到比他的思想还要高的牧场上,我们会觉得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59]显然在这个隐喻中,他本人是那牧羊人,而阅读就是他的“羊群”,“比他思想还要高的牧场”是先哲们的经典。他相信通过不断攀登,终有一天,会企及他的理想境界。

有了这样一个“生活简朴、内心丰富独立的成长中哲学家”的自我形象,他就可以抵御外在话语对自身的否定。例如,他在介绍自己隐居生活前表示,“哲学家甚至在生活的外形上也是处在时代前列的。他不像他同时代人那样地吃喝、居住、穿着、取暖”。谈到自己的破家当,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全部家具装在车上,只有“一些极不入眼的空箱子,除了哲学家之外,谁不会害羞呢?”更重要的是,这一身份有助于他获得虚幻的优越感。梭罗常以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傲视众人。他表示自己脱离人群的孤单之路,因为抄了近道,结果比寻常路要更为高贵。他认为,人类目前还残留在原始的低级状态之中;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清醒得足以有效地服役于智慧;一亿人中,才能有一人,生活的诗意而神圣;并不无自负地说,“假定一个人刚刚读了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古典作品……可是他根本找不到一个可谈的人。他只能沉默”。^[60]或许,他在《没有原则的生活》中引用的 James Macpherson 的诗句最能代表他这种自我认知——“我高高在上俯视众国/它们在我眼前化为尘埃/平静是我云端的寓所/愉悦是我休息的温床”。^[61]

综上所述,梭罗的话语实践与环保问题并无切实关联,而是他在现代化背景下,面对自身的身份困惑,对当时流行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雅传统的一种反拨。在其超然型性格的影响下,他采取需求最小化、独处、禁欲等策略抵御这些

话语的压制。在批判他人唯利是图、耽于享乐、精神空虚的同时,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生活简朴、内心丰富独立的成长中哲学家”的优越身份,并通过古典哲学家怀旧式的内投射使之合法化。虽然这种以疏离现实、疏离他人、疏离真实自我为特征的身份图式,个人主义色彩厚重,较少社会关怀,但其维护自身独立性、“修身向上”、立志成为高尚个体的基调是积极的。他复杂的策略组合为与其具有相似处境的现代人,在一个没有绝对真理的世界,如何面对现实对个体的异化,尤其是多元文化格局造成的身份危机、内心空虚,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模式与启迪。这些发现有助于揭示梭罗话语的生成机制,还原其思想的复杂性,也为重新审视其与超验主义、环保主义及道家思想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1][9] Sullivan, Robert. *The Thoreau You Don't Know*.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eBooks, 2009. pp. 1, 8.

[2] Warren, Austin. "Warren Lowell on Thoreau". *Studies in Philology*, Vol. 27, No. 3 (Jul. 1930): 442-461.

[3] Heitman, Danny. "Not Exactly a Hermit: Henry David Thoreau". *Humanities* 33.5 (Sep/Oct 2012): 14-17.

[4] Eagleton, Terry. "Ideology, Fiction, Narrative". *Social Text*, No. 2 (Summer, 1979): 62-80.

[5]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载黄颂杰主编:《弗洛姆著作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3-114页。

[6] 卡伦·霍妮有关性格策略和理想自我的论述见,卡伦·霍尔奈:《我们内心的冲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及卡伦·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

[7][54] 伯纳德·J·派里斯:《中文版前言》,载《我们内心的冲突》,王轶梅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15页。

[8][10][11][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31][32][33][34][35][36][38][39][40][43][47][49][50][53][57][58][59][60] 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96,236,15,24,38,102-103,76-77,66,157,92,98,79,151,50,147,50,149,146-147,45,26,3,35,60-61,72,248,238-239,240-244,246-247,5-7,8,26,62,103,42-43,123,14-15,117-118,112-113,14,116,119,44,98,15,72,44,100,119页。

[12][55] 卡伦·荷妮(霍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陈收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第272、269页。

[29][30] Thoreau, Henry David. *On Civil Disobedience*. Mozambook, 2001. pp. 9, 21.

[37] 卡伦·霍尔奈(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王轶梅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41] Eagleton, Terry.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1991. pp. 1-2.

[42] Mariotti, Shannon. *Thoreau's Democratic Withdrawal*.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0. pp. 89-90.

[44][46][48][51][52][61] Thoreau, Henry David. *The Essay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Richard Dillman. Ed. Rowman Littlefield, 1990. pp. 77, 75, 77, 80, 80, 83, 88, 84.

[45] 金衡山:《自由的意义——超验主义思想探析》,载《国外文学》2002年第1期,第54页。

[56] Kernberg, Otto F.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and Clinical Psychoanalysis*. Jason Aronson, 1995. p. 29.

[责任编辑:黎虹]